

经师易遇 人师难求*

——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境界

李中华

摘要：张岱年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学家。张岱年学说超越传统又不背离传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回应了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他提出中国哲学史的“综合创新”的逻辑建构，确立中国哲学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基本命题，从“对理性”“世界性”“实践性与独立性”提出对中国文化论战的超越，在充分吸收先进文明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不轻贱本民族的哲学智慧，经过对中国哲学的调适，使其成为新时代的理论文化资源，使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与哲学的认同。中国学者应该学习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精神，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文化承担者，而且为人类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张岱年 中国哲学 综合创新 新资源 新理论 新方法

在中国现代学术领域中，张岱年先生（1909—2004年）是一位德高望重、思维敏捷、学风淳朴、学术思想一贯、热切追求真理和极富

* 此为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四讲“经师易遇 人师难求——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与境界”。该讲座于2024年4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举办，隆重纪念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本次讲座的特邀主讲人兼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中国文化书院理事、创院导师李中华先生。本文在作者讲稿的基础上略加补充整理而成。本次讲座的评议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中国文化书院理事、创院导师魏常海先生，致辞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程乐松先生，主持人是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先生。

创新思维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学家。他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哲学理论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今年是张岱年先生诞辰115年，认真探讨与回顾其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内容及特点，对中国现代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乃至学术史的研究，以及对认识中国哲学和文化在现代的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广大后学对张岱年先生最好的纪念。下面我将与大家一起学习和探讨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境界。

导 言

（一）生平

张岱年先生，1909年5月23日生于河北省（当时称为直隶省）献县小堞庄。历代务农，至其祖父一代起，方应科举之始。其父亲张濂，进士及第，受职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被选为众议员，曾任沙河和枣强两县知事，晚年喜黄老之学，有传统文化根基。张先生11岁丧母，其兄张申府（大张岱年16岁）曾任职北大、清华，张岱年深受其影响。

张岱年青少年时期养成“致思之习”。16岁时上初中，开始阅读《老子》，而且有自己的一些感想。高一时修习“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在《师大附中》月刊上发表《评韩》（他一生的第一篇文章），批评韩非反道德教化和专重刑赏的观点，受到班主任汪伯烈先生的赞赏，称“张岱年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大学三年级的论文也不过如此”。接着又写了第二篇《关于列子》（高二，19岁）。这是一篇考据文章，“证明列子实有其人，反对列御寇系子虚乌有之说”，发表于《晨报副刊》（1928年3月）。

1928年（19岁），张岱年考入清华，入学后因不满于国民党的军事训练而退学，遂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33年（24岁）毕业。因在大学期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且成绩优异，旋即由冯友兰、金岳

霖两位教授推荐，受聘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秋季开学后讲授“哲学概论”，讲课内容主要为：导论、唯心论、实在论、实用主义及其他派别哲学，同时增加了唯物论、辩证法，“并且较详细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从1933年9月起，张岱年在清华任教不到一年，因父亲去世而丁忧，暑期辞去教职，离开清华，居家休养。两年后，与冯友兰先生的堂妹冯让兰女士结婚。又一年（1936年），由冯友兰推荐，回清华任教，讲授“哲学概论”和“中国哲学问题”两门课程。此时他亦完成了人生中独具匠心、别具风采、影响甚巨的《中国哲学大纲》这部名著。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时局紧张，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夫人暂避城内大姐家居住，因事变之急，遂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于是滞留北平，闭户读书，不与敌伪合作。

虽然当时蛰居沦陷的故都，心怀殷忧，但张岱年并未就此沉沦。他于1941年春开始撰写《天人五论》中的第一部《哲学思维论》，1942年撰写第二部《知实论》，1943年撰写《事理论》，1944年撰写《品德论》，一年完成一“论”。“其后生活日趋艰窘，就无力写作了。”在此期间，经王锦第介绍，他进入私立中国大学任副教授，讲授“中国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大纲”，讲义第一次排印。

1945年抗战胜利，清华大学1946年返京复校，张岱年先生回归清华，受聘为副教授，代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又讲“哲学概论”与“孟子哲学”，同时补写《天人简论》。至此，五论皆成，由“天人新论”改称《天人五论》，完成了他从事哲学思考的丰硕成果，也是他继《中国哲学大纲》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岱年先生整整40岁，他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深受鼓舞。我正值不惑之年，开始了新生活。”他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跨入崭新的时代。

20世纪5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受清华大学委派，到中国人民大学

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和“辩证唯物论”，同时受邀到辅仁大学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接着又在清华大学开讲“马列主义基础”课程。1951年（42岁）在清华大学晋升为教授。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文、理、法学院全部并入北大。张岱年先生同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沈有鼎、王宪钧、任华等教授集中到北大。他在清华前后共生活了约十年，如今又离开清华到北大，可谓“三进清华，三出清华”。

从1952年至1957年，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张岱年先生除了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外，还先后发表了八篇论文，撰写和发表了四部专著，共30余万字。

1957年，张岱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其学术活动被迫停止，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此时已是70岁的老人了。他不但没有气馁，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新的学术活动中。虽然已是高龄，学术创作却“炉火纯青”，进入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治学三阶段

中国哲学是在我国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语言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条件下发育的，因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话语系统、逻辑结构、价值取向、真理判断标准、哲学终极关怀等独特的品格，并且一直以比较稳定的形态存在和发展。这一态势直到近代方被打破，出现了中西方文化及哲学的激烈冲撞和辩争。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学术思想，在多元思潮的激荡、角逐中，经历了一场旷世难遇、痛苦环生的排拒、超越、接受、容纳、调适、重组等一系列重新选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选择了一条在充分吸收先进文明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既不要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的哲学。^①这也是张岱年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

^① 参见李中华《中国哲学的历程——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54页。

张岱年学说的结构，由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构成，他本人概括为，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其特点为学说贯通，前后呼应，整体性强。他的治学经历可分为发轫期、转型期和迸发期。

1. 发轫期

张岱年先生从1928年上大学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年，是他学术自由创造的一个最重要阶段。这期间他的第一篇文章《关于老子年代的假定》，于1931年发表在《古史辨》第四册中。该册由著名学者罗根泽编著，一共收录了10个作者的70篇文章。除张岱年先生以笔名张季同发表文章外，还有梁启超、胡适、刘盼遂、钱穆、冯友兰、唐兰、高亨、蔡元培、顾颉刚、罗根泽等十几位大家。张岱年先生22岁即著此文，在今天绝对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篇文章很长，是关于老子的真伪考证和老子《道德经》年代问题的考证，这很难得。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名家们的讨论，譬如他和罗根泽有过讨论，讨论也记录在《古史辨》中。

读大学后，正值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发表，其书“考察之精、论证之细”，使他非常敬佩，于是又进一步引发了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世界思潮》《大陆》《图书评论》等报刊上连续发表关于中国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及其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已显露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在中国哲学方面所具有的潜在学术实力和稳健、敏锐的学术气质。

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有了中文译本。因此在大学期间，张岱年便阅读了《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对张岱年产生了重大影响。张岱年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完全接受了辩证的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我以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超人哲学作了比较，认为

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①同样在短短的两年中张岱年又连续发表了《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的一贯》《关于新唯物论》《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文章，可谓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论深有所得。

在第一阶段的学术成果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等的文章一共44篇45万字，《中国哲学大纲》50万字，《天人五论》（尚未完成）17万字。这一阶段为他此后的学术经历和影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 转型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包括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是张岱年先生学术创作的一个转型期。所谓转型或定型，更多的是体现在张岱年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且以此为指导所展开的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他先后出版了四部学术专著，从书名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写作：《张载——11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他的十几篇学术论文，基本上也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如《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张横渠的哲学》等，这些论文非常强调中国哲学里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传统。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只有八年多，但是出的成果不少，四部专著加十几篇文章。

3. 迸发期

从1979年彻底平反到1995年，这15年是他学术迸发的时期。他在15年间出版了四部专著——《中学哲学史史科学》《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其中大部分是他给研究生班上课的讲义，特别是前两部。那时候张岱年先生年纪很大了，上课有点吃力，但他一讲就是半天。除了上述四部专著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7页。

以外，又发表了文章287篇（学术论文217篇，序跋、丛谈、读书杂记、文史漫谈、回忆录等70篇），合计70万字。其中仅1990年至1995年（81岁到86岁），他就发表了论文97篇，而且其序跋、丛谈、文献感言几乎都是在80岁之后写的。

值得一说的是，张岱年先生晚年写了151篇序。什么人都找他写序，即使彼此观念相反的大学同学，来找张岱年先生写序，他都有求必应。不是因为他是老好人，而是他达到了“兼和思想”的境界，“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兼”就是并容各种不同，也是兼爱、博爱、泛爱。可以说“兼和思想”是张先生最核心的概念，他提出“以兼易中庸”，认为和平的年代可以中庸，但战争年代“中庸”会使历史的进步停滞，所以还是“兼和”好。

一、提出中国哲学史的“综合创新”的逻辑建构

在中国哲学遇到中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冲撞时，有些中国学者做出了“综合创新”的选择，通过西方哲学的输入，中西哲学的对照，中国学者在世界变化的新条件下反思内外哲学的彼此长短，加强维护中国哲学传统。张岱年先生正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这里还要考虑张岱年学说的扬弃与守正，在变化观或发展观等方面，中西哲学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①，张岱年先生的发现是从古代中国思想中找到的，但要用中外两把钥匙去开锁。他目的是让人认识自己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再通过高级的逻辑建构，让现代人接受这些好东西，而不是仅仅借用外人的钥匙。因此，“综合创新”应该是张岱年先生最重要的一个理念、问题，或是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思想，涉及他的方法论的问题。1928年以后他念大学的五年间他实际上已经准备了《中国哲学大纲》的材料，所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页。

以到1936年、1937年就写成了《中国哲学大纲》，从学术价值和影响来讲，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史著作。从哲学史研究和学术史发展角度来看，这个《大纲》不仅可以和胡、冯二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比肩，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纲》的学术现代化程度、学术稳定性程度还有学术成熟程度都不在胡、冯之下。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提出中国哲学史的“综合创新”的逻辑建构，从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高峰，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个高峰，贯穿了他的一生学术思想。

（一）以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不是按照胡、冯哲学史的路子写的，而是问题史，其副标题是“中国哲学问题史”。所谓“问题”，即构成中国古代哲学重要思维成果，最能凸显中国哲学特点和哲学系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哲学所固有的，在整个中国哲学体系中占有主干的地位。按照他的《大纲》把中国哲学整个系统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构成了他的哲学史的第一个层次，即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宇宙论分本根论、大化论；人生论又分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又分为知论和方法论。

这三个部分再细分构成第二个层次，所以我们把它叫中国哲学的“八论”。本根论、大化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知论、方法论，从第二个层次的八个问题发展成这样一个脉络，一目了然看到中国哲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一看它的目录就可以看得出来，一目了然，提纲挈领。

第二个层次的论题又分别由若干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组成，所以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应该有16个，这个层次上排列的哲学问题都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这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最大的特点。一部中国哲学史是通过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所编织成的中国哲学之网。这种“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张岱年先生独创，

是和冯友兰、胡适两部哲学史最大的区别。这种写法从“横”的方面表征中国哲学的发展，在“横”的方面再做“纵”的描述，最大限度避免了一般哲学史以人物或专书历史顺序为纲造成的重复或条理紊乱的缺点。

我们在读中国哲学史的时候，读惯了胡适和冯先生的书，再读张岱年先生的书确实感到满眼新意。一般中国哲学无不讲自己的传统，所讲的心、性、情、意以及良知、良能等，都表示对人生、人性、人的本质及人的生命的一种体认。孔子的一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实现“仁以为己任”的抱负上。宋明理学家所展示的心理、理欲之辨，成为他们把握人生或人道的哲学基本问题。在他们看来，知识不能代表智慧，因此都必须通过“转识成智，这种以道德为终极目的而追求的结果，使不知道正义的名字”^①。张岱年先生的特点是有中国的哲学性质，没有西方的概念；有中国古代哲学的内涵，但能让近现代中国人吃透。本根论讲老子的道、周易太极、张载的气。什么是本根？就是宇宙的终极，宇宙根源性的概念，老子的道就是这个概念。这种写法应该说是近现代以来以张岱年先生作为开端，对后来的影响很大。现在对哲学史的研究，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路子，强调范畴、概念的明晰性，比如说对“道”的理解，对“太极”的理解都是具有对中国哲学本身特点的概念。老子的“道”，今天有多少人能搞清楚？简单讲好像是无为，但是“无为”怎么讲？包括对老子研究的人，对这个理解也不是很到位。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摆脱了在人物或者专书历史顺序中考证历史带来的烦琐。以人物或专书为历史顺序来写的哲学史，当然我们不否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开创性的。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和论文中对冯友兰、胡适有批评，强调他们各有优点和缺点，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页。

张岱年先生就是这样具有开放性，即“兼和”。这是他在大学五年中的学术积累才能写出来，这给今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挑战。当年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张岱年先生就一直说，你们要敢写。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像张岱年先生这样有创造的精神、读书的热情，敢于写文章。当然他从青年到晚年集大成都有一以贯之的质疑与构建，这个特点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可以像张岱年先生那样追求真理不停息。

（二）在了解中西哲学后由中国人写中国哲学史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在形式和方法上，还有西方哲学模式的痕迹。它在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三大部分构成上，参照了西方哲学的模式，但绝不影响其中国化内容。不仅不影响，而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西哲学的关系做了最大限度的调整和转变，使它成为真正中国人写出的哲学史。

《中国哲学大纲》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相对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有更大的创新性和进步。张岱年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特点，充分体现了张岱年先生卓然标新的学术创造精神。这个创新应该也是比较全面的，也建立了中国哲学史新范式。这个范式的影响特别大，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建构了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合法性范式和“洋为中用，以我为主”，让中国回到自身的民族哲学的建设。这两点，应该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它必定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哲学的民族化、现代化产生长期的影响。

张岱年先生强调，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不同的哲学范型，就是不同的范式，和西方哲学派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的学问也不能叫哲学，这什么意思？如果要把哲学看成是一个“类称”，不专指西方哲学，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名，如先秦的诸子之学、明清的道学等，它们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洋哲学是有相似性的。关于这一类的学问都可以叫哲学，实际上张岱年先生在20世

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形式不同，但内容上有相似的地方，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或者不是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应该有一个平等的立场，更为开放包容的精神。所以，在建立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阐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式、解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和真精神等方面，张岱年先生都有贡献。其突出表现是以中国哲学本有的思想范畴和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而不是用西方哲学的尺度来诠释中国哲学，即“回到中国哲学自身”，“让中国哲学自己说话”，进而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和独特的意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本根”“大化”“对理”“天人合一”等概念都是中国本身固有的，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哲学概念，这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能会更深入。因而张岱年先生对于建立中国民族自信心和现代中国哲学的独立都有很大贡献。

张岱年先生哲学史的成熟程度、稳定程度奠基于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这些文章阐述了中国哲学当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方面，揭示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悠久传统。经过他的挖掘，特别是对“气论”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开拓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气论的研究传统。例如，戴震在18世纪中期，用物质性的气，去说明人性，反对程朱理学“性即理”和把人性分成“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他认为，“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区以别焉是也”^①。戴震对传统人性论及伦理观的批判总结，改造了传统儒家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天赋道德论，这种贡献也是通过张岱年学说得以发掘出来的。

张岱年先生提炼和重新阐发“气论”是在整体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角度进行的，这对“气论”全新意义得到广泛揭示。经过张岱年先生的点拨，擦亮了宋代的三派。原来也是两派，即王阳明和程朱的一派，而“气论”没有地位。我们现在读张载的书，在中国哲学史古代的传

^① 《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83页。

统里，并没有得到强调的就是“气论”方面。通过对“气论”研究，还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对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一直到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的研究，还纳入了戴震等一大批哲学家，极大拓宽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丰富了内容，摆脱了哲学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经学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完成时代的学术转型及现代化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几乎看不到。

中国哲学中所固有的“气论”与中国古代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及中国古代书法、绘画等艺术和文学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通过哲学上对“气论”的研究，还带动了上述学科的理论发展。

二、确立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创造的综合”或“综合创新”，不是一时的、空洞的口号，而是毕生以“综合创新”的思维作为其学术研究的灵魂，所以他能采取开放态度，捐弃门户之见，撷取众家之长。

20世纪初，中国似乎还没有条件产生专业哲学家来从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文学革命”等口号，唯独没有“哲学革命”的口号。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尚未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体系，它只是延续着19世纪末尚未完成的近代哲学而已。当时学界一般谈到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而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但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也就是说，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名，如先秦诸子之学、魏晋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等，它们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并可归于这一类学问，便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

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①在张岱年先生看来，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哲学，而且这个哲学可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因此不能把西方哲学看作是唯一的范式。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有所说明。他认为，对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关键要看我们对于哲学的看法如何。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再蹒跚地跟随西洋哲学亦步亦趋，而是应该迎头赶上，从而超越西洋哲学所经过的阶段，创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哲学体系。对此，他十分感叹地认为：“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或则依傍古人，或则追随西哲，有独立的气魄的，实在太少。但文化之重建，须先有思想之独立，而如欲思想独立，必须有哲学的创造。”^②他大声疾呼，中国需要积极思想的“复活”。他深信，“西洋思想的输入，当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力复活之刺激。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这种具有创造力的思想的复活，当是张岱年心目中的“综合创新”。在他看来，这种“综合创新”的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③要突出表现是以中国哲学固有的思想、范畴和概念解释中国哲学，而不是削足适履，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哲学。此即“回到中国哲学自身”“让中国哲学自己说话”，从而揭示出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意蕴。如“本根”“大化”“天人合一”“反复”“两一”等概念范畴的厘析和对史料真伪的判断，对于21世纪的今天，未尝不是一种超前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眼光。这些研究，对于建立中国民族自信心和现代中国的学术独立，均产生深远而

① 《张岱年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242页。

③ 同上书，第199页。

巨大的影响。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及其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特别注重挖掘、总结和表彰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辩证法和道德理想的传统。这也是他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创新思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实际运用。

（一）唯物

与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相比，张岱年先生强调唯物论这一特点尤其明显。怎样创造，才够得上张岱年先生心目中的“新哲学”呢？对此，张岱年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做了详细的回答。这篇文章是张岱年先生针对当时学术界各种各样的“新哲学”“新唯物”的标榜，集几年的哲学思考和文化论争的实践，在其兄张申府“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思维。他说：

在今日，哲学中实仍有许多对立等待着综合的，如欲成立一个精密的哲学，更须重视解析派的贡献，即解析法。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①

他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长久的唯物论传统，并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法思想互相结合。从周秦一直到明清，许多卓越的唯物主义者都同时是辩证思想家。在中国哲学史中，辩证法观念往往不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阐发的，而主要是由唯物主义哲学家阐发的，而且这种倾向在西方自赫拉克利特以后，唯物论辩证法观念趋于淡薄，而在中国却是有自长久的历史。^②由于张岱年先生重视中国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注意并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他还先后撰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262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130—131页。

哲学中的辩证法》《论外界的实在》《谭“理”》《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等一系列阐述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文章。

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唯物”，即当时颇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又称“新唯物论”。张岱年先生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表彰唯物论、推崇辩证法，从始至终，未尝有变，其主要原因，即认为新唯物论是“最有征验，最合科学，且最符协于生活实践的哲学”。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新唯物论的宇宙论是对理的，注重历程与等级”。他说：

对理法是观察现象的方法，是发现现象之实相的方法……唯用对理论，然后才能见到文化的实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笼统。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不知用对理，是不能把握文化之实际的。^①

张岱年先生不仅较早地进入这一研究，表现出非凡的思考能力和学术创造能力，而且涉猎广博，对当时中、西、马三家之说均进入思考和研究状态，从而为他以后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其二，“新唯物论的知识论之基本观点是实践，注重知识之实践的基础及外界为知识之源泉，更进而阐明知识之社会性历史性，由以解决感觉经验与概念知识之对立，以及真知之相对与绝对”；其三，“新唯物论的人生论之根本见地在认识人之社会性，又注重人与环境、自由与规律之对理，而最注重者是变革世界的实际道路。”^②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248—249页。

② 同上书，第274页。

（二）解析

所谓“解析”，实是一种方法。“其要义在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忽，而以清楚确定为目的。治学之基本功夫，实在于解析：厘别不同的意谓，剖分复杂的事实。哲学有所说，必须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欲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则必有假于解析。”^①张岱年先生早年治学，除推崇唯物论、辩证法外，亦非常重视以罗素为代表的西方解析派哲学。认为这派哲学的长处是概念清晰，分析精确，逻辑性强，因此它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在哲学中最占优势的方法”。任何哲学“要有真实的进步，更不能不用解析”，“作哲学功夫，第一要作解析工夫”。^②张岱年先生认为，哲学研究中有许多方法，但解析法是基础，在哲学上提出一个概念或命题，首要的前提是须用解析法把这些概念或命题说清楚，因此“解析”实体现思想的自觉。

（三）理想

所谓“理想”，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不如对“唯物”“解析”二项解释得那样清楚，但主要趋向多是指中国哲学。他认为，新唯物论，虽也注重理想，但“对理想之研讨，实不为充分，而其注重分析，不充分乃更甚”。这可能是他不同意新唯物论之处。至于“解析”，对理想亦不重视，“讲解析者，皆不喜言理想，认为哲学的任务只是循解析以显真，而非所以求善美”^③。也就是说，新唯物论及解析派哲学，在处理“理想”问题时，均有不足之处。特别是解析派哲学，未能把“理想”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任务。其实，“根据生活实践以创立伟大切实的理想以为人类努力之标的，正是哲学之重要任务”，“哲学而不谈理想，只是放弃本务而已”。^④张岱年先生认为，在谈理想方面，中国哲学最为丰富，“中国哲学是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的，且有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269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③ 同上书，第271页。

④ 同上。

卓越的贡献，我们既生于中国，对于先民此方面的贡献，实不当漠视，而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①。

可以说，新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解析是西方哲学的代表，而理想则是中国哲学的代表。“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即是中、西、马的综合为一。这是20世纪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所追求的大目标。这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新思维，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有这种新思维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往往以学派自限，要么全盘西化，要么本位文化，就是主张建立中国新哲学的人，往往也是折中调和。因此，张岱年先生特别强调，他所谓“综合创新”或“创造的综合”，决非混合或调和。“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②“凡创造的综合，都不只综合，而是否定了旧事物后出现的新整体。创造的综合决非半因袭半抄袭而成的混合。”^③

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追踪到古代没有，但在张岱年先生那儿有。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便已提出“批判继承”“中国特色”“求真”“求实”“自然之天”“物质之天”“气本论”“心本论”“生本论”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精要提法，这些概念和提法，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广泛地使用，张岱年先生对20世纪30年代的各家学说均有吸收与批评。他虽崇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西方的解析派哲学，但绝不以此自限。他经常强调，任何哲学学说都非仅集妄，而是必有所见。因此对任何哲学理论，都不应完全排斥，而是应该容纳、吸收其对的成分。不仅容纳吸收，更需要提高之，对任何哲学（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都应且扬举且抛弃，且擢拔且拂除，且吸纳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239页。

③ 同上书，第257页。

且扫荡”^①。他认为这种态度，即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本身的要求。他对胡适、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郭沫若等人的中国哲学研究均有吸收，但也都有批评。如早在1933年发表的《谭“理”》一文中，他就批评了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理在事先”和“共相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等观点；早在1932年发表的《评胡适的新著〈淮南王书〉》一文中，他批评了胡适对道家与黄老学的混淆，并且指出胡著中许多“不切”和“牵强”的提法。这些批评都十分中肯，而且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批评也都是对的。1949年后，冯友兰先生就改变了上述两条看法，这与张岱年先生的批评不无关系。

三、中国文化论战的超越

张岱年先生早年的思想学术活动即在中西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开始的。他在中学和大学的读书时代，已受到中、西、马三股思潮的激荡，并且对此三方面的思想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附中主任林励儒先生为全校作了一次学术讲演，讲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我听了非常感动、非常佩服。从此，‘要把任何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工具’这一道德律令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之中。”^②关于西方哲学，除康德外，他还读了一些英文哲学著作。其中“最喜读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之书，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③。在西方哲学方面，五四前就传入了笛卡尔、洛克、柏格森、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五四时期西方的哲学流派几乎都涌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通过胡适译介的实验主义哲学、通过张申府等人译介的罗素哲学、通过郑昕等人译介的康德哲学、通过洪谦等人译介的维也纳学

①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58—359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5页。

③ 同上书，第577页。

派以及通过贺麟等人译介的黑格尔哲学，等等。当时进入中国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股具有革命性的强大思潮，其流风所及，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知识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所包含的革命精神，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从文化角度审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文化格局，实际上存在着中学、西学和号称超越中学、西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三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同时影响着正在走向现代的中国思想界。这三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各以其特有的思想张力，相互比较，相互排斥，同时也相互借鉴和相互吸纳。“可以说，它是继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互争长短、相互激荡、互相吸收的历史前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和展开的三大思潮的激烈角逐，为中国社会和整个中国现代史埋下了思想分裂和统合的种子。同时也为中国哲学或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积聚了理论方法和思想前提。”^①在张岱年先生的青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西方哲学思潮尤其是“全盘西化论”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直至1935年1月，上海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掀起了对全盘西化论反弹的高潮。在中西文化的论战中，中国传统文化或哲学往往处于守势。

张岱年先生参加了这一轮文化论战，其基本倾向和基本观点也是反对全盘西化，但他不是固守“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而反对，这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有本质上的不同。他和同时代学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构新的思想理论模式，并运用这种能够超越传统但又不背离传统的新理论、新方法，对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加以调整、重组和改造，使其变成新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源，同时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又能得以保持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摆在当时中国学术界面前的一项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主要有三：

^① 李中华：《中国哲学的历程——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62页。

（一）对理性

1935年初展开的新一轮中西文化论战，对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一个转折。由此他开始更深入地探讨哲学和文化上的“综合创新”的逻辑建构。他先后在《国闻周报》上连续发表了《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文章，集中思考这类问题。从方法上说，张岱年先生强调文化的“对理性”。所谓“对理性”，即今所谓辩证的“对立统一”。

他认为，以此方法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哲学，便可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运用文化的“对理性”，看待中西文化，即可“一方面，对于全盘承受西洋文化的见解，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对于恢复旧文化的见解，也是反对的”^①。也就是说，必须辩证地看待文化问题，不能因为反对全盘西化，而跳到另一个极端。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从方法上讲，它们都违背了文化的“对理性”原则。

（二）世界性

张岱年强调文化的“世界性”。“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单元，所以中国文化不能与世界文化背道而驰。”^②更不能自我封闭、自我隔绝。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不可磨灭的精粹的因素，“例如古希腊及罗马即是如此，中国亦然，中国的文化，其中有些堪以作为对人类社会有较大贡献的精粹”，这些具有不磨价值的文化元素，“发育于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之中，却不止是一个民族的，在本质上是全人类的”。^③这就需要跳出“本位文化”的限制，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合到世界文化之中，使其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洋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应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229页。

② 同上书，第233页。

③ 同上书，第155页。

服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①

此即张岱年先生一贯主张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张岱年先生所以一再强调“新的创造”或“创造的综合”，其目的即在于打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传统与西化问题上的二元对立思维，要么全盘西化，要么保存国粹，这都是文化上的绝对主义，不符合中国的需要。

（三）实践性与独立性

张岱年先生强调文化的“实践性”和“独立性”，他认为，“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只空言是不成的，必有实践的努力”^②。因此，文化的实践性是检验真理的准绳。应该说，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实践性”观点，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思想与行动并重，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独秀曾明确表示：“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能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③他告诫当时的青年：“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④这种观点也是张岱年先生一生所坚持的。他早在1934年发表的《关于新唯物论》中已提出，以“实验为真理准衡”作为新唯物论知识论的三大“精旨”之一，他认为：“新唯物论之以实践为真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238—239页。

② 同上书，第234页。

③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④ 同上书，第365页。

理的准衡，实融纳实用主义之长而无其短。实用主义亦重实践，亦重行为，而将有结果与有效用（有利之结果）混为一事，乃成一种诡谈。新唯物论则能免此。且新唯物论所谓实践，非指个人的实践，乃指大众的实践，社会公众之实践，故能完全免于将真理个人化。”^①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正是在中、西、马多元文化的激荡、角逐中，经历着一场旷世难遇的改造发展过程。其中，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和保守主义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是这场文化论争的主角。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文化立场与上述两派均有较大的不同。他所采取的方法和所持的立场，确实体现了一种“综合”的趋势。此即他在批评十教授“一十宣言”的文章中揭示的那样：

近年以来，在复古纯欧化两种主张外，原也有人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②

张岱年先生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持一种理解、批判的态度，并以上述三点作为对所谓“本位文化”的补充和说明，这都反映了张岱年先生对文化与哲学所抱持的科学严谨态度。他的这些观点都是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后，张岱年先生陆续出版《文化与哲学》和《中国文化概论》等著作^③，提出并探讨了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关于文化系统的分析、民族精神以及文化的综合创新等课题。其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文化的性质、前途、追求和基本精神做了深入的思考，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132页。

② 同上书，第229页。

③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这些重要成果凝聚了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挚爱。

结 论

张岱年先生长期思考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创新问题，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起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人再跟随西洋哲学蹒跚学步，而应该迎头赶上，创立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体系。张岱年先生对中西各家学派、各家学说均有批判与吸收，他始终贯彻一生信奉“综合创新”的思想方法。他的学术研究有非常多的新见解，学术态度、治学方法、学术风格都有许多特点。

他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境界有以下八个特点：一是平实，无高谈阔论，没有高危之谈和悬殊之论；二是合理，不以偏概全和牵强附会；三是清晰，无晦涩之辞和含混之言；四是简明，无烦琐论证；五是严谨，不绝对、不武断，主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张岱年先生经常说这句话：“你们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不要矛盾百出。”六是公允，无偏颇之辞，不立门户之见；七是谦和，不盛气凌人。大家看到张岱年先生都觉得很可爱，所以都找他写序言，他写的序多达150余篇，在近现代都找不出来像他这样的先生，这说明他谦和、不摆架子。八是讲究原则，张岱年先生不是所谓的老好人，他明辨是非，追求真理。